

從「政治實踐」到「心性體證」： 朱熹注《孟子》的歷史脈絡

陳 逢 源^{*}

提 要

《孟子》乃是極富爭議之典籍，從「子」而及「經」，乃是地位的提昇，其中涉及「官學化」與「經典化」兩項過程，前人於唐、宋之際《孟子》升格運動，多有討論，但對於朱熹匯聚聖賢相傳歷史意象，回應宋儒有關孟子爭議問題，卻是缺乏檢討，筆者撮舉《孟子集注》徵引材料，一窺朱熹思索所在，遂能得見在「儒學傳承」與「政治反叛」辨證當中，回歸於心性，以「道統」形塑孔、孟之傳，思索《孟子》經典地位的過程。足證理學並非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內聖」工夫更非「外王」事業的捨離，朱熹吸納諸儒意見，反省儒學之傳，確定《孟子》價值，乃是回應北宋儒學實踐的結果，用心所在，於茲可見。

關鍵詞：孟子、朱熹、道統、理學、經學

^{*}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

一、前言

有關《孟子》討論，往往集中於心性之辨，此一議題出於辨證儒學核心的需求，論者勝義紛披，精彩可見，然而回歸孟子地位考察，並非如此單純，由「子」入「經」涉及定位的轉變，於此前輩學者周予同先生標舉為孟子「升格」過程¹，徐洪興先生進一步撰成〈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²，然而孟子地位的調整，關乎詮釋角度的改變，然而檢視其背景，周敦頤濂學、邵雍象數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二蘇蜀學等，一時俱起，北宋深浸於儒學自覺思潮當中，諸儒相互激盪，遂有清朗面貌，孟子升格必須置於此氛圍中考察。近人夏長樸先生撰〈尊孟與非孟——試論宋代孟子學之發展及其意義〉³，黃俊傑先生《中國孟學詮釋史論》中有一章「宋儒對孟子政治思想的爭辯及其蘊涵的問題——以孟子對周王的態度為中心」⁴等，關注所及，乃是宋儒運用《孟子》深化政治改革情形。然而仔細推敲，前賢所論，可以得見《孟子》「官學化」過程，但對於《孟子》「經典化」內涵⁵，似乎尚未觸及，如何從宋代諸儒爭議聲中，化其紛擾，歸於純粹，建構出儒者永恆歷史情懷，其中失落的環節即是朱熹將孟子置於四子之列撰成《四書章句集注》，確立《孟子》的經典地位⁶，於此細節，朱熹後學有至為清楚的認知，云：

¹ 周予同撰：《群經概論》（高雄：復文書局，1986年11月），頁112。

² 徐洪興撰：〈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下），《孔孟月刊》32卷3期（1993年11月），頁9-16、32卷4期（1993年12月），頁36-44。

³ 夏長樸撰：〈尊孟與非孟——試論宋代孟子學之發展及其意義〉，《經學今詮》三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頁559-624。

⁴ 黃俊傑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9月），頁111-165。

⁵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言五代後蜀孟昶刻蜀石經，列有《孟子》，但徐洪興考證其說，其中僅有十經，《公》、《穀》於宋仁宗皇祐年間補刻，《孟子》則是宋徽宗宣和年間補刻，其間相距一百八十年，詳見徐洪興撰：〈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孔孟月刊》32卷3期（1993年11月），頁15。但據王應麟撰《玉海》（文淵閣《四書全書》冊94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43〈藝文〉「宋朝石經」一條所載已有《孟子》，頁189。但「嘉祐石經」一條，卻未列《孟子》，頁194。足見北宋一朝，《孟子》已具地位，但是列之於經，載錄之間，頗為參差，地位尚有模糊之處。但是以後世取用習慣，《孟子》之經典地位，乃是將《孟子》置於「四書」脈絡當中，如《明史·藝文志》立有《四書》一門，足見元、明以後撰作情形。

〔清〕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5月）卷35卷首〈四書類序〉甚至認為宋人以前古注存者寥寥可數，不必旁出分類，徒增紛亂，論著一併歸於「《四書類》」中。頁710-711。準此而論，朱熹完成「四書」之結集，才是後世「經典」化的關鍵所在。

⁶ 參見拙撰：〈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9月），頁20-38。

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祕，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皦皦乎不可尚已。⁷

由於確立孟子地位，儒學內涵才有明確了解，筆者曾草撰〈朱熹孟子集注對宋代孟子議題的吸納與反省〉一文⁸，一窺朱熹對北宋孟子議題的思考，然而重點所在，似乎應有更聚焦的分析，因此以前文檢討結果，作為後續討論依據，「政治」與「心性」之間，了解朱熹思考的進程，尤其秦漢以降中國皆為封建帝國，在帝王無上威權中，《孟子》強調民本的政治主張，竟然可以成為經典，形成儒者共同追尋典型⁹，悖反的發展，乃學術史上重大公案，細節之間，緣由所在，也必須於朱熹注《孟子》尋求進一步的答案。

二、北宋儒學的傳承

漢世之時，趙岐（108—201）〈孟子題辭〉言漢文帝曾置博士，後獨立五經，《孟子》未列其中¹⁰。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列於儒家諸子略¹¹，地位不與五經齊等，直至韓愈（768—824）撰〈原道〉一篇，強調「孔子傳之孟軻。軻死後不得其傳焉」¹²，儒學從五經教授的思考，化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聖人相傳之歷史情懷，標舉孟子傳承聖人的精神，孟子地位才有相應的討論。清儒趙翼（1727—1814）言「宋人之尊孟子，其端發于楊綰、韓愈，其說暢於日休也。」¹³乃是正確的觀察，楊綰表彰《孟子》事見

⁷ 〔元〕汪克寬撰：〈重訂四書集釋序〉，《環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2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683。

⁸ 參見拙撰：〈朱熹孟子集注對宋代孟子議題的吸納與反省〉，《紀念孔子誕辰 256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四）》（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2009 年 9 月 23 日-25 日），頁 1431-1460。

⁹ 黃俊傑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 9 月）引徐復觀的觀察，先秦儒家經典中的政治主體在人民，帝制中國的政治主體卻在國君，因而形成「雙重主體性」的矛盾，後代儒者承繼思想，《孟子》具有撻伐專制的力量，而「孟子以人民為本位的政治思想，是飽受專制荼毒的、苦難的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永恆的鄉愁。」頁 57-89。論述深有所見，頗能指出《孟子》一書所具之價值，以及後代儒者詮釋之衝突與矛盾。

¹⁰ 〔漢〕趙岐撰：〈孟子題辭〉，《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 年 12 月），頁 7。

¹¹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卷 30〈藝文志〉，頁 1725。

¹² 〔唐〕韓愈撰：〈原道〉，《韓昌黎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年 9 月）冊 2，卷 11，頁 58。

¹³ 〔清〕趙翼撰：〈尊孟子〉，《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1960 年）卷 4，頁 16。

於《新唐書·選舉志》¹⁴；皮日休（834？—902）撰〈請孟子為學科書〉，收於文集之中¹⁵，所爭為科舉，然而風氣初開，主張並未成功。

北宋之初，沿襲唐風，檢覈諸儒言論，柳開（948—1001）自稱「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文集中有〈續師說〉，並曾改名「肩愈」¹⁶，柳開推崇《孟子》乃是遵循韓愈意見的結果，重視韓愈高於孟子，〈昌黎集後序〉云：

聖人不以好廣於辭而為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為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於夫子矣。雖孟子之為書，能尊於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於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於先生，聖人之經籍雖在殘缺，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詠規戒，答論問說，淳然一歸於夫子之旨，而言之過於孟子與揚子雲遠矣。¹⁷

推崇孔子以韓愈承之，而孟子、揚雄僅止於亂世中「存聖人之道」而已，地位並不與韓愈齊等，對於《孟子》顯然未有深刻的體會。孫復（992—1057）推尊孟子特別留意歷史定位問題，〈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

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諸謂此也。……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為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復學孔而希孟者也，……嘻！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¹⁸

據文所載，仁宗景祐五年（1038）孔子四十五世孫孔道輔（985—1039）出知兗州，於鄒縣四墓山找到孟子墓，去其榛莽，建成孟廟，以孔子子孫尋孟子之墓，極具象徵意義，於北宋諸儒間，形成頗受關注事件，按覈孫復〈上孔給事書〉所

¹⁴ 〔宋〕歐陽脩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2月）卷44〈選舉志上〉，頁1166-1167。

¹⁵ 〔唐〕皮日休撰：《文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九〈請孟子為學科書〉，頁212-213。

¹⁶ 〔宋〕柳開撰：《河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8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六〈上符興州書〉，頁283。卷1〈續師說有序〉，頁241-242、卷1〈名系并序〉，頁240。

¹⁷ 〔宋〕柳開撰：《河東集》卷11〈昌黎集後序〉，頁318。

¹⁸ 〔宋〕孫復撰：《孫明復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兗州鄒縣建孟廟記〉，頁174-175。

載，孔道輔於家廟中原就祀有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五賢之像，強調「彼五賢者，天俾夾輔於夫子者也」¹⁹，由孔子而下，尋求儒者相傳線索，顯然蘊釀已久，孫復表而彰之，自承「學孔而希孟」，於儒學自覺運動中深具引領作用。相較前人尊韓而及孟，孫復指出孟子彰顯聖聖相承線索，存孔子之道於異端邪說中，功不在禹下，由孔及孟，才是正確的觀察，孟子地位高於揚雄、韓愈，推崇孟子更為明顯。循此發展，弟子石介（1005—1045）《徂徠集》討論孟子地位更多，如：

深惟箕子、周公、孔子、孟軻之功，則吏部不為少矣！余不敢廁吏部於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後吏部。

孔子為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之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數百年，復有吏部。

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揚雄、有文中子、有韓吏部，……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啻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啻達諸身也。²⁰

孟子、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五賢成為經常列舉的詞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聖人系譜作為儒者志復古道嘗試銜接的淵源，身膺其任，令人感動，只是孟子與韓愈間，孰者為先，立場似乎仍有游移，以〈讀原道〉、〈尊韓〉之作，石介顯然更重視韓愈。事實上，仁宗慶曆前後，范仲淹（989—1052）〈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²¹，激昂儒者淑世情懷，乃是從《孟子·梁惠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²²轉化而來，慨然承擔的氣魄，鼓舞後世無比勇氣，極具指標作用。歐陽脩（1007—1072）表彰韓愈人所共知，然而〈與張秀才棐第二書〉云：「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²³推尊韓愈更及於孟子價值的肯定，然以文集列舉孟子情況觀察，則是逐漸脫離與荀子、揚雄、王通、韓愈並列的習慣，其中〈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一文引石介之言「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

¹⁹ 〔宋〕孫復撰：《孫明復小集·上孔給事書》，頁172-173。

²⁰ 〔宋〕石介撰：《徂徠集》卷7〈讀原道〉，頁226、卷7〈尊韓〉，頁227、卷15〈答歐陽永叔書〉，頁289。

²¹ 〔宋〕范仲淹撰：《范文正集》（文淵閣《四書全書》冊108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7〈岳陽樓記〉，頁623。

²²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16。

²³ 〔宋〕歐陽脩撰：《歐陽脩全集》卷67〈與張秀才棐第二書〉，頁979。

軻矣。」²⁴石介以孟子自我期許，成為歐陽脩關注焦點，然而按覈蘇軾（1037—1101）「歐陽子，今之韓愈也」²⁵說法，歐陽脩表彰韓愈更勝於孟子。至於以孟子自許，北宋諸儒王安石（1021—1086）無疑是最為重要人物，〈奉酬永叔見贈〉云：

欲傳道義心雖壯，學作文學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捫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座中。只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為貺豈宜蒙。

26

標舉「道義」與「文學」，王安石指出與歐陽脩不同的生命情調，至於「能窺孟子」，「何敢望韓公」的期盼，孟子似乎在韓愈之下，可以了解王安石以孟子自比，而以韓愈比擬歐陽脩，申明謙遜之意，然而先韓愈後孟子的觀點，似乎即是在王安石遙契孟子的關注下逐漸改變。王安石重視孟子以道自任的情懷，對於孟子傾慕，勝於韓愈，比較其詩〈孟子〉「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韓子〉「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²⁷，評價已有不同，尤其表彰之餘，更及於文字闡發，撰有《孟子解》十四卷，相關而及，其子王雱（1044—1076）有《孟子解》十四卷，連襟王令（1032—1059）有《孟子講義》五卷，門人龔原（約1043—1110）有《孟子解》十卷，許允成有《孟子新義》十四卷，多數作品今已亡佚²⁸，但注解《孟子》已成風尚，孟子地位遂有全新討論，王令云：

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於《孟子》異者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²⁹

深究精微，於性命之際、出處之要，孟子更有獨到之處。新學新政議題，既啟孟學新方向，也落實於政策當中，據徐洪興所考，包括熙寧四年（1071）二月，《孟子》列入科舉；熙寧七年（1074）判國子監常秩（1019—1077）請立孟軻像於廟廷；元豐六年（1083）十月詔封孟子為「鄒國公」；元豐七年（1084）五月孟子

²⁴ 〔宋〕歐陽脩撰：《歐陽脩全集》卷34〈徂徠石先生墓誌銘〉，頁506。

²⁵ 〔宋〕蘇軾撰：《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卷10〈六一居士集敘〉，頁316。

²⁶ 〔宋〕王安石撰：《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卷55〈奉酬永叔見贈〉，頁449。

²⁷ 〔宋〕王安石撰：《王安石全集》卷73〈孟子〉、〈韓子〉，頁558-559。

²⁸ 〔清〕朱彝尊撰：《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2月）卷233，頁4-7；卷234，頁1。

²⁹ 引自朱彝尊撰：《經義考》卷233〔宋〕王令撰，〈孟子講義自序〉，頁5。

配享孔廟；政和五年（1115）政府承認兗州鄒縣孟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等七人從祀；宣和年間（1119—1125）《孟子》刻入石經等³⁰。自唐以來籲請的訴求，於新黨主政時逐步完成，從文化而及政治，由諸儒提倡到廟堂尊崇，強調文化傳承意涵的《孟子》轉化為儒者政治革新的精神指標，孟子地位的確定與儒者思索參與「政治」態度有密切的關聯，於此發展，一改以往由韓及孟的思考路徑，「新黨」變法，固然歷史評價不高，但使王安石以「師臣」身分大展治國方略³¹，無疑深化了《孟子》政治改革的訴求。從表彰韓愈，改為尊崇孟子，風氣改易，王安石可謂居功厥偉，對新黨印象不佳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³²，王安石的貢獻，於此可見。

只是相較於此，尊孟風潮仍有異議，李覲（1009—1059）撰《常語》直指《孟子》有違君臣上下之分，云：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為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偽而辯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吾以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³³

³⁰ 徐洪興撰：〈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孔孟月刊》32卷3期（1993年11月），頁14。並參見〔宋〕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5月）卷10「《石經孟子》十四卷」條，頁169。

³¹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11月）卷233載熙寧五年五月甲午神宗挽留王安石辭相位云：「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爵祿，但以懷道術可以澤民，不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他，天生聰明，所以又民相與盡其道以又民而已，非以為功名也。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豈與近世君臣相類。……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頁15。所謂「道德之說」，視臣為師，可以說是韓愈所揭示儒學自覺的最終表現，神宗並非懵懂闇弱之君，充分授權，固然是王安石激昂出神宗革新的熱忱，但從思想脈絡檢視，更是北宋諸儒以來發揚儒者精神的結果。

³²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90「禮七」，頁2294。

³³ 所引文字見〔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卷12所錄《常語》，頁92。亦見於〔宋〕余允文撰：《尊孟辨》（文淵閣《四書全書》冊19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卷中，頁529-530。今本李覲撰：《李泰伯先生全集》（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71年7月）並未收錄本段文字，〔清〕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卷153「《盱江集》

歸納其中有四項要點：一、孟子矯激之言亂君臣大義；二、孟子蔑視周天子，勸諸侯為王；三、孟子鄙視對周室有功之齊桓管仲為鄙夫，而與尊王之義不相合；四、孟子主張暴君放伐論，有紊亂名分之虞。³⁴所列四項，重點不外乎孟子「政治」主張有礙皇權統治。李觀不喜孟子，於宋儒中頗為出名，厭惡之情，甚至傳為軼事³⁵，門人陳次公、傅野皆有《述常語》之作，足見影響³⁶。至於司馬光（1019—1086）撰《疑孟》則有強烈政治動機，云：

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它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³⁷

批判孟子違反君臣分際，新舊黨爭反映於《孟子》相歧詮釋立場，讓人聯想是針對王安石尊孟而發³⁸，但司馬光之子司馬康（1050—1090）撰《孟子節解》，父子

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提要云：「此集為明南城左贊所編，……宋人多稱觀不喜《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載觀《常語》十七條，而此集所載，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廢太甲』、『周公封魯』三條，蓋贊諱而刪之。」頁 3208。今本未見，乃是後人刪略，情形如同史官諱言明太祖議罷孟子配享事，可見《孟子》尊為經典之後所產生的影響。

³⁴ 夏長樸撰：〈尊孟與非孟——試論宋代孟子學之發展及其意義〉，《經學今詮》三編，頁 591。

³⁵ 〔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8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7，頁 310。李觀不喜孟子，頗見於宋人載錄，如〔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38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114，頁 743。不詳撰者，《道山清話》（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3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頁 668。〔宋〕葉紹翁撰：《四朝聞見錄》（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3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3「賢良」一條，按覈《揮塵錄》、曾慥〈序李賢良字泰伯詩〉、《登科記》等，詳考事件所出，推測應是後人因李觀不喜《孟子》，附會為不讀《孟子》，說法可供參考。頁 714-718。

³⁶ 〔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 13，頁 100-101。

³⁷ 〔宋〕司馬光撰，《傳家集》，《疑孟》，（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9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73「齊宣王問卿」，頁 665-666。

³⁸ 〔元〕白珽撰，《湛淵靜語》（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86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2 云：「或問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蓋有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欲人主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為安石之言未可盡信也。』」頁 309。

顯然不同調³⁹，就以同屬舊黨之二程，程頤（1033—1107）撰《孟子解》；三蘇當中，蘇轍（1039—1112）有《孟子解》⁴⁰，舊黨並非全然排斥孟子，足見從《孟子》興發儒學自覺，乃是北宋儒者逐步發展的共識，於此爭議中，觀點更深一層，二程為關鍵人物，《二程全書》屢屢可見有關的講論，如：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⁴¹

孟子雖不及孔子，甚至不及顏淵，但於發揚孔子精神，有功於儒學大矣。甚至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補強儒學傳承脈絡，以往將孟子置於荀子、揚雄、韓愈賢人系譜當中，於今荀子、揚雄已無法與列，《論語》、《孟子》成為儒學根本，此一思考為朱熹所收受，遂有「經典重構」的訴求⁴²。只是新舊黨爭，北宋淪亡，尊孟激昂政治改革的氣魄，卻無法達致政治澄明的效果，爭議所在，成為儒者必須進一步克服的論述困境。

三、朱熹對「尊孟」、「疑孟」的反省

³⁹ 〔清〕朱彝尊撰：《經義考》卷 233「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一條引姚福言「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頁 4。

⁴⁰ 〔清〕朱彝尊撰：《經義考》卷 233，頁 5-6。

⁴¹ 〔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 6 月）《遺書》卷 6，頁 76、卷 10，頁 93、卷 20，頁 196、卷 28，頁 235、卷 28，頁 239。

⁴² 參見拙撰：〈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經典重構與儒學內涵的再思索」一節，《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20-38。

宋儒由「尊韓」而至「尊孟」，既與政治實踐相關，對於《孟子》所具「政治」性格遂有深刻的反省，黃俊傑先生歸納北宋孟子爭議內容，從「不尊周王」議題化之後，形成三個重要問題：一、王霸之辨；二、君臣關係；三、尊孔問題⁴³，糾結複雜，難以釐清，或因不喜孟子政治主張，進而反駁其儒學繼承地位；或因承認孟子發揚儒學貢獻，進而接納其政治主張，然而反覆辨證，「儒學傳承」才是諸儒共同的思考，只是對於「儒學」與「政治」相歧的觀察，涉及新舊黨爭，加上家國淪亡之痛，南宋之初，對於孟子地位的檢討更為複雜，以邵博（？—1158）撰《邵氏聞見後錄》輯錄各家批判孟子言論，云：

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辯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說於下方，學者其折衷之。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文繁不錄。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⁴⁴

除《荀子》「非十二子」外，其他包括司馬光《疑孟》、蘇軾《論語說》、李觀《常語》、陳次公《述常語》、傅野《述常語》、劉敞〈明舜〉、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劉道原〈資治通鑑外紀〉、晁說之〈奏審皇太子讀孟子〉等共九家⁴⁵，存錄宋儒批判孟子意見，用意所在，恐不僅止於參考而已。邵博為邵雍（1011—1077）之孫，邵伯溫（1057—1134）次子，依《宋史》「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⁴⁶的說法，政黨屬性至為明顯，批駁孟子顯非偶然。至於余允文撰《尊孟辨》，則是與「反孟」者論辯，立場全然相反，所辨五家，包括司馬光《疑孟》、李觀《常語》、鄭厚《藝圃折衷》、蘇軾《論語說》，以及王充《論衡》等，《四庫全書總目》據朱熹對余允文人品的觀察，推測余允文乃是迎合風氣之作，並非真有衛道之心⁴⁷，朱熹撰〈讀余隱之尊孟辨〉一文逐條討論⁴⁸，有言「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也有「恐隱之辯亦有未明處」，甚至觀察所及直指「疑歐陽氏、王氏、蘇氏未得為真知孟子者，亦隨其所見之淺深，志焉而樂道之爾」⁴⁹，推究細密，於此可見。雖然余允文心態未必可取，但不可以人廢言；表彰孟子諸儒，固然有功於聖學，但所見未必正確，南宋諸儒對於孟子的討論，涉及黨派、時尚

⁴³ 黃俊傑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頁 125。

⁴⁴ 〔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 11，頁 81。

⁴⁵ 〔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 11-13，頁 81-106。

⁴⁶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433〈邵伯溫〉，頁 12851。

⁴⁷ 〔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35「《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提要，頁 721。

⁴⁸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2 月）卷 73〈讀余隱之尊孟辨〉，頁 3645-3695。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繫之於紹熙三年（1192）所作，頁 1085。

⁴⁹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73〈讀余隱之尊孟辨〉，頁 3653、3655、3690。

風氣，更為紛擾，朱熹於此之關注，乃是回歸於《孟子》本文得其分判。事實上，朱熹閱讀《孟子》出於其父的安排⁵⁰，《朱子語類》載云：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⁵¹

朱熹從《孟子》中得到成賢成聖的鼓舞，日後從學李侗（1093—1163），體會更深，《朱子文集別集》錄〈程欽國〉一文云：

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稿。⁵²

依束景南先生所考，稿成於紹興三十年（1160）⁵³，朱熹匯整諸家說法，間附體會，稱之為「說」，或言為「集解」，標示醞釀過程⁵⁴，日後終於有《孟子集注》之作，從徵引材料，保有朱熹反省前儒意見的結果，如《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也」一章，朱注引程子之言：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

⁵⁰ 〔宋〕李侗撰：《李延平集》（《叢書集成新編》第6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1月）卷1〈達朱韋齋暨吳少琳書〉云：「侗再拜，上問韋齋監稅朱友，向來所委求大字《語》、《孟》，聞吳少琳在嚴州印歸，遂以應命。別寄人求之，諒不易得也。」頁238。稱朱松為監稅，可以了解約在紹興三、四年間，朱熹始入小學，大字《論》、《孟》當是為朱熹準備，書既不易得，可見朱松之用心。

⁵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4「自論為學工夫」，頁2611。

⁵²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第10冊別集卷三「書」〈程欽國〉，頁5146-5147。

⁵³ 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考云：「所謂『近見延平李先生』，即指是年十月往延平見李侗。而『疾病乘之』者，是年朱熹確嘗有疾，〈延平答問〉李侗紹興三十年五月八日書：『元晦偶有心疾，不可思索……靜坐看如何。』〈與籍溪胡原仲先生〉：『向欲得真齊州半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便中寄示，幸甚。蓋病雖小愈，不得不過為隄防也。』故可確知此〈答程欽國〉書作於紹興三十年十二月間。」頁264-265。

⁵⁴ 束景南撰，〈朱熹前四書集注考（從《四書集解》到《四書集注》）〉云：「蓋朱熹早年之作多致力廣搜先儒之說而成一編，收羅宏富，細大不捐，欲為以後作精注簡解準備材料，故其早年之作多稱為『集解』，如《孟子集解》、《大學集解》、《毛詩集解》等。」收入氏著：《朱熹佚文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頁601。

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⁵⁵

「可謂實矣」一段，指出王道並不高遠複雜，文字雖簡，語意完足，至於後引文字論及「天命」，明顯溢出詮釋範圍，按覈《論孟精義》，本段文字出於伊川⁵⁶。孟子論王道，重點在於「養生喪死無憾」，但朱熹引程子之言，分別孔子與孟子時代不同，春秋天下尚能尊周，戰國之時百姓不知有周，天命既改，「王道」也者，並非僅是百姓生活藍圖，強調君臣關係並非膠固不變，民心所向，才是關鍵，歧出之處，朱熹援據伊川之言，補入時移世改的概念⁵⁷，用意並非闡釋經旨而已，而是回應北宋諸儒對於孟子不尊周的批評。此一觀念，成為朱熹思考由殷及周政權移轉的答案，《孟子·離婁上》「天下有道」一章，朱注云：「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⁵⁸朱熹強調天命靡常，周之有天命，從殷商而來，天命所在，殷商臣服於周，無礙於原本君臣之義；相同道理，周失天命，孟子期待有德者繼起，也就無所謂違反分際的問題。所謂尊周，必須置於時間環節，以天命來詮釋，也就無怪乎朱熹於此章申明「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⁵⁹反省所在，封建帝王固然有其威勢，但威勢來自天命，天命歸諸民心，重點既然是民心所向，民心唯德是依，朱熹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引太史公、伊川之言：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⁶⁰

仁義出於天理之公，人心所固有，君子並非不知利，「仁義」並不迂闊，言義不言利，才是從根本入手⁶¹，自此「政治」轉入道德論述，朱熹言其為聖賢之心⁶²，

⁵⁵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05。

⁵⁶ 〔宋〕朱熹撰：《論孟精義》（《朱子全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頁654。

⁵⁷ 〔宋〕朱熹撰：《孟子序說》引程子之言「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四書章句集注》，頁199。「時」之不同，聖人有不同情懷，朱熹思考淵源於此可見。

⁵⁸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79。

⁵⁹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80。

⁶⁰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02。

⁶¹ 此一問題反映出二程對王安石學術的檢討，王安石得君行政，固然是千載難逢機會，然而以「利」誘之，從人主心術上下功夫，終至風氣大壞，〔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

乃是探驪得珠之言。

再者，孟子放伐觀念乃是直接干犯忌諱言論，也是令上位者最不安的主張，齊宣王「臣弑其君可乎」的問題，無疑也是北宋反孟諸儒共同的疑惑，朱注：「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申明孟子用意，後引王勉之言：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⁶³

所謂「放伐」並非人人皆可為之，而是「仁」與「暴」對抗，其主張才能成立，下位者也要有相應條件，否則「放伐」大旗反而成為「篡弑」的藉口，天下更為混亂，朱熹於此提出補充意見，也澄清諸儒反孟的質疑。王勉未見於《宋史》、《宋元學案》，事蹟不顯，《建甌縣志》卷十〈選舉志〉紹興二年（1132）壬子有進士王勉⁶⁴，疑為其人，朱熹徵引其說，足見蒐求之廣。《孟子·梁惠王下》「諸侯將謀救燕」章，朱注引范祖禹（1041—1098）之言：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⁶⁵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和平」與「武力」方式雖異，但異中有同，聖人相繼乃是孟子為人君立下的典範，相較於此，人臣也要有相同的堅持，不可屈於威勢而棄其學。此外，《孟子·盡心下》「盡信《書》」章，朱注云：

〈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

全書》卷3云：「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眾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頁58。反省之深，必須從北宋以來儒學發展考察，參見拙撰：〈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45-48。

⁶² 此條材料其實是融鑄伊川與尹焞之言，「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實出於尹焞，見〔宋〕朱熹撰：《孟子精義》卷1〈梁惠王上〉，《論孟精義》，頁650。

⁶³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21。

⁶⁴ 詹宜猷、蔡振堅合撰：《建甌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95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2月），頁164。

⁶⁵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23。

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⁶⁶

「放伐」不在於殺人，孟子申明文獻不可盡信，是為免後世疑惑，以為征伐必須流血，孰不知文獻並無錯誤，朱熹直究孟子用心，強調仁心不可違失，乃是化解前儒的批評⁶⁷。以《孟子·離婁上》「求也為季氏宰」章，朱注引林之奇（1112—1176）之言：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⁶⁸

儒者關懷乃是百姓，「率土地而食人之肉」，罪莫大焉，武力脅迫，僅能勝其一時，無法得到民心，《孟子·盡心下》「不仁而得國者」章，朱注引鄒浩云：

言不仁之人，聘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⁶⁹

得民心之不易，於此可知。《孟子·梁惠王上》「不嗜殺人者」章，朱注引蘇轍之言：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⁷⁰

概括之歷史觀察，未必無例外，但用意至為清楚明白，「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乃是在是至理名言，朱熹無疑從北宋諸儒正反意見中，確認孟子見解的價值。

所以人君必須以恤民為念，《孟子·梁惠王上》「寡人願安承教」章，朱注引李郁之言：

⁶⁶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4〈盡心下〉，《四書章句集注》，頁365。

⁶⁷ 按覈〔宋〕傅野撰：《述常語》云：「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見〔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13，頁101。對於文獻尊信態度，推究其動機，朱熹顯然是有為而發的議論。

⁶⁸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83。

⁶⁹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4〈盡心下〉，《四書章句集注》，頁367。

⁷⁰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07。（日）大槻信良撰：《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776年4月）據金履祥《集注考證》，此言出於蘇轍，頁327。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⁷¹

人君未必有率獸食人之心，只是一念之偏，欲望無窮，終致禍國殃民。《孟子·告子上》「一日暴之」章，朱注引伊川、范祖禹之言：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⁷²

君主必須親賢人而遠小人，於此得見「涵養氣質」的重要，伊川嚴肅，往往為人所詬病⁷³，但朱熹卻得見儒者見微知著，於關鍵處入手的苦心。《孟子·離婁上》「一正君而國定」章，朱注引伊川之言：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⁷⁴

人君心正，天下才能正，於此申明輔相職責在於「格君心之非」，北宋王安石得君行政，固然彰顯孟子政治革新氣魄，但以利說人主，未能於心性之間分判義、利之別，關鍵處偏失的結果，於此千古難得機會，終致失敗。《孟子·梁惠王下》朱注引楊時（1044—1130）之言：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

⁷¹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05。

⁷²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1〈告子上〉，《四書章句集注》，頁332。

⁷³ 〔清〕畢沅編撰：《續資治通鑑》（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5月）卷80「哲宗元祐元年」條下云：「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頁2010。

⁷⁴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4〈公孫丑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85-286。

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⁷⁵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細微之失，相去甚遠，朱熹引楊時之論，強調人臣必須「遏人欲而存天理」，政治議題轉為道德心性的討論，《孟子·公孫丑下》「湯之於伊尹」章，朱注云：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⁷⁶

君臣上下，各有職分，君主尊賢貴德，臣子勇於責難，儒者要有「賓師」的氣魄，朱熹思考所在，乃是吸納宋儒政治實踐，回歸於儒學反省的結果，原本政黨意氣之爭，憑藉著《孟子》文本討論，諸儒意見終於有分判的依據。

四、回歸於心性的思考

朱熹《孟子集注》徵引前賢言論，散見於章句之間，分別而論，無法見其思考，甚至以為有超乎詮釋範圍之處，但撮舉分析，朱熹援引並非無意義，《孟子·滕文公下》「豈好辯哉」章，朱注引尹焞（1061—1132）之言：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⁷⁷

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承禹、周公、孔子三聖之功，尹焞申明儒學於是非之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於此遺害百姓，禍及後世，實是至深之體會⁷⁸，朱熹援引而論，直指問題核心，儒者不是只有追求「政治」權力一途，

⁷⁵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19-220。

⁷⁶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43。

⁷⁷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6〈滕文公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73。

⁷⁸ 〔宋〕朱熹撰：《四書或問》（《朱子全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載朱熹對諸家講論分析，頗有涉及新、舊黨爭之檢討，如「蓋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又反啟後來之禍也。」頁702-703。「謝、楊之說，各有所偏，蓋其情性氣象之不同如此。而楊氏欲使天下之事，皆至於極弊而後圖之，則其害為尤甚，豈懲於熙、豐新政之禍，而矯枉過直，以至於斯乎？」頁790。「范、呂蓋嫌於元祐之改熙寧也，故不及道其常，而遽以變為正也，此雖君子之過，然心一有偏而其不可掩者

必須推究學術之精微，才能無所偏失，從《孟子集注》徵引材料，諸儒有關《孟子》「政治」與「儒學」的爭議，回歸於「心性」辨析，終於有分判的依據。

（一）由人心見天命

對於《孟子》的質疑，主要集中於尊周立場以及君臣分際，李觀直言「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⁷⁹，然而「王道」也者，《孟子》云：「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⁸⁰陳述養民原則，未見與「君臣之義」有何衝突，只是陳述「王道」對象為「梁惠王」而非周王，令人產生不尊周的聯想，朱熹《孟子集注》一方面引伊川之言加以澄清，另一方面也有些微的文字調整，檢覈《論孟精義》可以得見線索，云：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⁸¹

比較而言，朱熹《孟子集注》刪去了「勸齊之可以王者」，而作「勸齊梁之君也」，回歸於勸勉時君立場，避免不「尊周」的爭議，語氣更為和緩全面，差異所在，乃是朱熹的調整⁸²。再者，補入「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以聖賢之心提問，標舉天命概念，強化儒學傳承意義，《孟子》原就論及「天命」⁸³，「命」之討論，本是先秦儒學重要議題⁸⁴，朱熹於此形上問題，引尹焞之言：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

如此，學者亦因可以自警省矣。」頁 911。新政固然有弊，但矯枉過正，同樣導致天下陷於紛擾，不可挽救，學術必須究析精微，不流於意氣，方能歸之於正。《四書或問》與《四書章句集注》是配合之作，其徵引去取之間，意見載於《四書或問》，足見其反省時政的思索。參見拙撰：〈義理與訓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徵引原則〉，《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319-323。

⁷⁹ 見〔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 13 所錄《常語》，頁 100。以及〔宋〕余允文撰：《尊孟辨》卷中，頁 540。

⁸⁰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03。

⁸¹ 〔宋〕朱熹撰：《孟子精義》卷 1〈梁惠王上〉，《論孟精義》，頁 654。

⁸² 參見拙撰：〈從體證到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撰作歷程〉中「反覆鍛鍊時期」一節，《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105-116。

⁸³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9〈萬章上〉云：「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四書章句集注》，頁 308。

⁸⁴ 勞思光撰：《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 年 12 月）第二章最後為「『命』觀念」、頁 97-100；第三章「孔孟與儒學」最後亦申明「史觀問題」以及「天、性、命之關係」，頁 189-203。從原本人格天進入道德論述之天命觀，乃是孔孟儒學開展人文精神之重要成就。

子而已。」⁸⁵

「禪」與「繼」傳位雖有不同，但「天命」所在，「義」之所在，道德辨證其實是從聖賢系譜中發展而出，有趣的是朱熹徵引前人之說，往往在《孟子》討論政治議題時，補入孔、孟傳承的說明，如《孟子·萬章下》「敢問不見諸侯」章，朱注引徐度云：「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⁸⁶異地而處，孔、孟同道，然而堅持所在，從「王道」到「天命」，政治訴求必須回歸於道德考察，唯有藉由儒學價值的確認，方能化解前人意見的分歧，《朱子語類》載有朱熹與門人楊至的討論：

至云：「……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之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卻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溫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為天命之改？」曰：「……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至。《集義》⁸⁷

此為楊至在紹熙四年（1193）、五年（1194）所錄，門人對於朱熹引伊川之言，體會不深，提問之中，有對司馬光「疑孟」的反省，與今本相校，「行王政」一句已經刪除，「天命」無可回復，固然是「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天王已不能正其權」，但真正關鍵是「生民塗炭」、「大勢已去」，天怒人怨，朱熹給予最清楚的說明是「人心都已去」，朱熹拈出「人心」，無疑為王道思想尋得義理的確解，孟子循人心而倡王道，道德乃是政治的基礎。

（二）君臣以義相合

朱熹並且及於君臣分際的討論，《孟子·滕文公下》「陳代曰不見諸侯」章，朱注引楊時（1044—1130）之言：

⁸⁵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9〈萬章上〉，《四書章句集注》，頁309。

⁸⁶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0〈萬章下〉，《四書章句集注》，頁323。

⁸⁷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51，頁1224。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⁸⁸

從君臣倫常轉為出處進退的檢討，君臣有上下之分，但儒者不應迎合人君，孔、孟雖欲行道，卻不會枉屈而行，按覈《論孟精義》其中尚有數句，云：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⁸⁹

儒者以君子為目標，既有操縱之術，也無法達致君子直道而行的結果，「以術行道」與「心正」乃是悖反命題，堅持儒者要有主體意識，歷經王安石變法，於儒者出處間，朱熹遂有更深的反省。《孟子·萬章上》「百里奚自鬻於秦」章，朱注引范祖禹、尹焞之言：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⁹⁰

當「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君子無自汙之道，賢者未遇，鄙賤之事，不恥為之，但聖賢相遇，得君之後，行道卻不能有絲毫委屈，原因乃是「道」的崇高，儒者必須直道而行。《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見齊宣王」章，朱注引范祖禹之言：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⁹¹

君臣原就有立場的矛盾，然而儒學最可貴之處，乃是儒者的自我堅持。事實上，

⁸⁸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6〈滕文公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65。

⁸⁹ 〔宋〕朱熹撰：《孟子精義》卷6〈滕文公下〉，《論孟精義》，頁708-709。

⁹⁰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9〈萬章上〉，《四書章句集注》，頁313。

⁹¹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22。

有關君子出處間，宋儒甚至討論孔子與孟子的差異，《朱子語類》載二程之言：

程先生曰：「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⁹²

孔子能上能下，孟子能大不能小，於此分出聖賢高下。《孟子·離婁下》「君之視臣如手足」章，朱注引潘興嗣（1023？—1100）、楊時之言：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⁹³

孔子、孟子雖然有別，但君臣以義相合，人君不可不禮遇其臣。《朱子語類》載有一則討論，可見朱熹深化之處，云：

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慰之辭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⁹⁴

彰顯孟子以賓師自處，無疑給予朱熹深刻的啟發，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君臣倫常，固然是核心價值，但轉為賓主、師生關係，儒者遂有高尚其志，直道而行的自信。

（三）回歸於心性

諸儒對於孟子「政治」觀點的爭執，朱熹得見心性論述的重要，〈孟子序說〉引程子之言，云：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⁹²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5，頁 1309。

⁹³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 8〈離婁下〉，《四書章句集注》，頁 290。

⁹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5，頁 1316-1317。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⁹⁵

二程承認孟子「性善」、「養氣」皆是有功於後世之論，但對於孔子、孟子間，分析其中差異的興趣，似乎大於建構孔、孟傳承的思考，承認孟子價值，卻又覺得與孔子相較似乎尚有距離，然而從小注云：「至字，恐當作聖字」，細節之間，指出孟子為聖人，反映朱熹承繼二程的進程處⁹⁶，《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章，朱注云：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⁹⁷

「天理」與「人欲」之辨，使政治議題，轉為道德論述，「人心」是一切的關鍵，朱熹對於《孟子》「性善」的肯定，較之前儒更為精準，會有「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的感慨，無疑是反省北宋政治實踐的結果，此於〈孟子序說〉朱熹引韓愈「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說法下引程子之言：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⁹⁸

⁹⁵ 〔宋〕朱熹撰：〈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199。

⁹⁶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5月）冊3「朱子評程氏門人」云：「朱子自幼即生長於伊洛傳統之氛圍中，其早年為學，主要途徑，乃為自程門諸子上窺二程，又自二程《語錄》進究《論》、《孟》、《學》、《庸》四書。就其《文集》及著述先後言，此實斷無可疑者。而朱子學問與年俱進，乃能由二程而識破程門諸子之病失所在，復能由《論》、《孟》、《學》、《庸》四書而矯糾二程所言之亦有疏誤。釋回增美，以之發揚二程之傳統，誠朱子在當時學術界一大勳績也。」頁217。「釋回增美」乃是對於朱熹承繼二程最佳的描述，參見拙撰：〈錢賓四先生超越門戶視野之四書詮釋——以朱子新學案為研究範圍〉，《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9年5月），頁327-352。

⁹⁷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02。

⁹⁸ 〔宋〕朱熹撰：〈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198。

回歸於人性，確認性善為儒學的核心價值，孟子終於從荀子、揚雄、韓愈諸賢系譜中脫穎而出，《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為世子」章，朱注云：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是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⁹⁹

朱熹推之精微，確認孟子性論價值，朱熹〈孟子序說〉引楊時之言：

《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¹⁰⁰

君心正則國定，事功從心性工夫得之，所謂「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用計」、「用數」之功業，其實是人心陷溺的結果¹⁰¹。性善為儒學思想核心，歐陽脩雖為北宋大儒，但論述既偏，也就無法得見《孟子》真正價值，朱熹綜納前賢意見，〈孟子序說〉將楊時說法列之於末，自有作結之意，從紛擾之中，回歸「性善」主軸，孟子地位於茲確立。

（四）道統之傳

從「性善」確認孟子價值，但對於李觀「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¹⁰²的批判，遂有孔子與孟子傳承關係的思考，《孟子·離婁下》「仲尼不為已甚者」章，朱注引楊時之言：

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

⁹⁹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4〈滕文公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52。

¹⁰⁰ 〔宋〕朱熹撰：〈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199-200。

¹⁰¹ 配合〔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6月）《遺書》卷3呂大臨所錄云：「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頁58。可以了解心術之間，乃是程門共同思考的問題。

¹⁰² 見〔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卷12所錄《常語》，頁92。以及〔宋〕余允文撰：《尊孟辨》卷中，頁529。

是稱之。」¹⁰³

孟子表彰孔子不遺餘力，承繼孔子職志，至為明顯，只是孔、孟之間，是悖反還是繼承，朱熹對於儒學的掌握，遂能得見孟子承繼的線索，《孟子·離婁下》朱熹綜合「舜明於庶物」、「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王者之迹熄」、「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諸章，云：

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¹⁰⁴

從聖人相繼中，孟子得出慨然承擔的歷史情懷，「自任之重」、「不得而辭」指出君子無可逃於天地的使命，儒者不止為當世帝王服務，還要有聖賢相承，身膺其任的自覺，所以孟子上承於孔子，更溯及舜、禹、周公相繼的精神，表彰聖人系譜用意所在也就清楚明白。〈孟子序說〉引韓愈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下引程子之言：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¹⁰⁵

既非蹈襲，又非鑿空，證據並不充分，但二程接受韓愈說法，朱熹又引作思考依據，補入孔、孟間傳承脈絡，確定孟子儒學傳承地位，《孟子·離婁上》「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朱注云：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孔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裡，學者宜潛心焉。¹⁰⁶

本章亦見於《中庸》第十九章¹⁰⁷，《大學》、《中庸》、《孟子》義理相通，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彼此相承，所謂「學者宜潛心」，乃是於此暗示孔、孟傳承，著力既深，朱熹甚至於《孟子》最後〈盡心下〉最末一節，云：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乎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

¹⁰³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8〈離婁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91。

¹⁰⁴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8〈離婁下〉，《四書章句集注》，頁295。

¹⁰⁵ 〔宋〕朱熹撰：〈孟子序說〉，《四書章句集注》，頁198。

¹⁰⁶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7〈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282。

¹⁰⁷ 〔宋〕朱熹撰：《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頁31。

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¹⁰⁸

揭示孟子志繼其傳的訴求，「天理民彝」無疑是天人合德的彰顯，聖聖相繼，提供「俟後聖於無窮」的無限期許，成為《孟子》一書深具暗示的符碼（codes）¹⁰⁹，相同的安排，也見於《論語》最後〈堯曰〉一篇，引楊時之言：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¹¹⁰

於是歷敘堯、舜、湯、文、孔子得見相承脈絡，《論語》、《孟子》同樣以聖人系譜作結，彰顯慨然承擔情懷，細節之間，如出一轍。千載之下，二程為解碼之人，朱熹於《孟子集注》附入一段程頤所撰「明道先生」墓的序文，云：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其情也哉？」¹¹¹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成為反駁反孟意見的利器，也成為釐清尊孟未得其實的說明，唯有二程於儒學空缺中，得見孔、孟精神，於是上承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下及於曾子、子思、孟子，「明道先生」心領神會，形塑一種聖聖相承史觀，朱熹特別拈出「道統」一詞，概括此一發現，〈中庸章句序〉云：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君，皋陶、伊、

¹⁰⁸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4〈盡心下〉，《四書章句集注》，頁377。

¹⁰⁹ 〔英〕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an）、〔美〕琳達·夏爾斯（Linda M. Shires）撰，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9月）第五章「對文本的解碼：意識形態、主體性、話語」，頁126。

¹¹⁰ 〔宋〕朱熹撰：《論語集注》卷10〈堯曰〉，《四書章句集注》，頁194。

¹¹¹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卷14〈盡心下〉，《四書章句集注》，頁377。

傳、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¹¹²

回歸於「心性」得見孟子得孔子之傳，朱熹以道統綰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聖人相繼，以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儒學相傳的歷史情懷，終於獲致《孟子》激昂儒者志氣的真正方向。思索聖人氣象，原是宋儒重要議題，從揣度聖人精神，形構「道統」線索¹¹³，《孟子》經典價值再無可疑。

五、結論

漢唐以來《孟子》涉及複雜定位問題，宋代諸儒從中獲致政治革新的力量，激昂儒學的覺醒，然而回歸心性，終於確定孟子價值。朱熹化解衝突，澄清疑義，遂有回應李觀孟子不傳孔子的見解，云：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

¹¹² 〔宋〕朱熹撰：〈中庸章句序〉，《四書章句集注》，頁 14-15。

¹¹³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冊 8，卷 74「雜著」〈讀書之要〉載：「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頁 3726。從揣摩聖人氣象，回歸於經典內涵的掌握，無疑是朱熹完成經典建構極為重要的過程，自此從議論孔、孟差異，轉為孔、孟相承的討論，參見拙撰：〈道統與進程：論朱熹四書之編次〉，《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頁 168-169。

所同然者耳。¹¹⁴

「道統」是展現生命終極關懷歸之體系建構的結果，所謂「未易言也」，正是朱熹一生思索方向，用力既深，故能得到後人普遍的共鳴，黃榦（1152—1221）撰〈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陳淳（1159—1223）撰〈道學體統〉與〈師友淵源〉、蔡沈（1167—1230）撰《至書》、車若水（約 1209—1275）撰《道統錄》、王昶撰《擬道統志》與《道統錄》、趙復撰《傳道圖》等，皆以承擔「道統」為己任，影響所及，「道統」一詞成為定位朱熹學術重要準據¹¹⁵，只是以「道統」來定位朱熹，乃是後人推究的結果，並非本文關注範圍。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徵引前賢意見，於孟子議題並未及於王安石、司馬光¹¹⁶，然而按覈《朱子文集》、《朱子語類》，卻又屢屢可見對尊孟、反孟兩派的反省，前儒往往批評理學重「內聖」而輕「外王」，殊不知經由數代儒者的努力，終於從「外王」中得見「內聖」的價值，朱熹學術無疑是對應時局極富反省的結果。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北宋表彰孟子固然已成風潮，但黨派立場不同，「尊孟」、「疑孟」爭議乃熾，倘若無朱熹回歸於心性，標舉儒學精神，確立孟子地位，時勢變革之下，《孟子》恐又湮沒，於此足見朱熹注《孟子》的歷史意義。綜合所述有如下結論：

- 一、宋儒表彰韓愈進而發現孟子價值，歷經慶曆時期的思考，到新舊黨爭，在尊孟與反孟之間，意見分歧，然而從二程及諸儒意見中，朱熹剔除疑義，終於確立孟子地位。
- 二、朱熹以「天命」消解「不尊周」的質疑；以儒者應有之出處態度，分判君臣分際，然而回歸根本，遂能得見「性善」為儒學思想的核心，於此皆是回應諸儒質疑的結果。
- 三、朱熹思考所在，天命出於民心，君臣以義相合，從北宋儒者政治實踐中，君心正則國定，學術辨析精微，事功必須從心性工夫得之，《孟子》精彩所在，於茲得見。
- 四、朱熹進一步綰合聖聖相承意象，揭出「道統」概念，從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傳中，深化儒學歷史情懷，確立得孔子之傳的線索，《孟子》經典地位終於完成。

朱熹於諸儒分歧意見中，淬煉儒者慨然承擔的氣魄，貢獻所在，人所同見，何錡

¹¹⁴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73〈讀余隱之尊孟辨〉「李公《常語》上」，頁 3663-3664。

¹¹⁵ 〔宋〕黃榦撰：〈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勉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6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卷 36，頁 406-423。

¹¹⁶ 陳鐵凡撰，〈四書章句集注考源〉一文列舉《孟子集注》有三十六家，王安石而無司馬光，錢穆等撰，《論孟研究論集》，頁 66。但按覈〔日〕大槻信良撰：《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朱熹〈離婁上〉所引王氏，其實是王勉。頁 447。

（1128—1175）於朱熹〈雜學辨〉後跋語云：

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為楊、墨則不自覺，……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為心，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為非，而聖言之為正也。¹¹⁷

「以孟子之心為心」，乃是至為深刻的觀察，封建帝王雖然擁有威權，然而天命出於民心，必須向道統低頭；儒者雖居人臣，但以賓師自許，遂有高尚其志的情懷，朱熹思索儒學方向，其功大矣。筆者整理朱熹《孟子集注》徵引材料，進而及於北宋諸儒有關《孟子》議題的討論，朱熹並非不重視政治實踐，只是於此紛擾中確認《孟子》心性價值，遂有由理學入經學的思考，撮舉分析，期以彰顯朱熹思索所在，只是思之反覆，難免偏失，尚祈博雅君子不吝指正，有以教之。

附記：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提醒，讓筆者有更深一層的思考，本文乃執行國科會計畫「聖賢系譜的建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道統論』背景考察」所獲致之成果，助理為王志瑋同學，計畫編號為：NSC97-2410-H-004-163-，在此一併致謝。

¹¹⁷ 〔宋〕朱熹撰，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72〈雜學辨〉（何叔京〈跋語〉附），頁 3633。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趙岐撰：〈孟子題辭〉，《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年12月）。
-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
- 〔唐〕韓愈撰：《韓昌黎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9月）。
- 〔宋〕柳開撰：《河東集》（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8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孫復撰：《孫明復小集》（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9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范仲淹撰：《范文正集》（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8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司馬光撰：《傳家集》（文淵閣《四書全書》冊 109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8月）。
- 〔宋〕朱熹編：程顥、程頤原撰，《二程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6月）。
-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
- 〔宋〕朱熹撰：《論孟精義》（《朱子全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宋〕朱熹撰，黃坤校點：《四書或問》（《朱子全書》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宋〕黃榦撰：《勉齋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6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
- 〔元〕汪克寬撰：《環谷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2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朱彝尊撰：《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2月）。
- 〔清〕紀昀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5月）。
- 〔清〕趙翼撰：《陔餘叢考》（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

二、近人論著

- 束景南撰：《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

- 束景南撰：《朱熹佚文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 周予同撰：《群經概論》（高雄：復文書局，1986年11月）。
- 詹宜猷、蔡振堅合撰：《建甌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95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2月）。
- 黃俊傑撰：《中國孟學詮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9月）。
- 勞思光撰：《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86年12月）。
- 陳逢源撰：《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9月）。
- 錢穆撰：《朱子新學案》（《錢賓四先生全集》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5月）。
- 〔日〕大槻信良撰，《朱子四書集註典據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4月）。
- 〔英〕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an）、〔美〕琳達·夏爾斯（Linda M. Shires）撰，張方譯：《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9月）。

三、引用篇章

- 徐洪興撰：〈論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上）、（下），《孔孟月刊》32卷3期，1993年11月、32卷4期，1993年12月）。
- 夏長樸撰：〈尊孟與非孟——試論宋代孟子學之發展及其意義〉，《經學今詮》三編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 陳逢源撰：〈朱熹孟子集注對宋代孟子議題的吸納與反省〉，《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之四）》 北京：國際儒學聯合會，2009年9月23日-25日）。
- 陳逢源撰：〈錢賓四先生超越門戶視野之四書詮釋——以朱子新學案為研究範圍〉，《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2009年5月）。

From Politics to Mental Character ——The Context of Zhu Xi's Commentary for *Mencius*

Chen, Feng-yuan*

Abstract

The *Mencius*, a disputable canon, promoted from a section of the schools of philosophers (*zi*) to the classics (*jing*) through being officialized and canonized. While former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discuss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Menciu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were, however, few criticisms on the Song savants' arguments about Mencius, which was left by Zhu Xi through the historical notion of "sagely transmission." As a result, I will take the *Mengzi jizhu*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f Mencius*) as quotation to investigate Zhu Xi's contemplation, which will manifest the dialectic of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al rebellion. Within this investigation, we can speculate about the process of the *Mencius* being canonized, for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alects which were molded through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by reverting to mental character. Zhu Xi confirmed the merit of the *Mencius* and then used it to prove that the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lixue*) is not the instrument for politics, and philosophers, moreover, work hard for interior sageness which cannot be

* Dr. Chen, Feng-yuen is a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ffected by their exterior achievement, according to imbibing various savants' points of view as well as rethinking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To be sure, this is the meticulous and fruitful result of Zhu Xi's response to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Keywords: Mencius, Zhu Xi, The Succession to the Way (*daotong*),
The Philosophy of Principle (*lixue*),
The Philosophy of Classics (*jingxue*)

